

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 (增訂本)

趙容俊 著

受 王 美 止 寶
歸 其 樂 女 子
貞 勿 廟 用 吉

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

(增訂本)

趙容俊 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 / 趙容俊著. — 增訂本.
— 北京: 中華書局, 2011.9

ISBN 978 - 7 - 101 - 07386 - 7

I. 殷… II. 趙… III. ①甲骨文 - 研究 ②巫術 - 研究
- 中國 - 商代 IV. ①K877.14 ②B992.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68525 號

書 名 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增訂本)

著 者 趙容俊

責任編輯 陳 喬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張 26 插頁 2 字數 420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7386 - 7

定 價 65.00 元

序

韓國趙容俊博士出身於具有深厚漢學傳統的家庭，自少學習漢文漢學，在成均館大學漢學系卒業後，進入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受教於著名甲骨學家許進雄教授，取得碩士學位。隨後他來北京，於清華大學歷史系從我攻讀博士學位，並在北京語言文化大學講授韓文。

大家知道，甲骨學早已成爲一門國際性的學科，有許多外國學者從事，但在韓國專門研究的學人還很少。趙容俊博士氣質沉潛，學習勤奮，對甲骨文及殷商文化已有扎實根柢。他曾以數年功力，將許進雄教授的名作《簡明中國文字學》譯爲韓文，交由韓國高麗大學出版社出版。在甲骨研究方面，尤能登堂入室，所著《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一書，原於 2003 年在臺灣文津出版社出版，現經修改增訂，即將由中華書局印行。他是不畏這一學科的種種艱難，努力鑽研，結合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等的最新成果，探索殷商時期的巫術與有關文化，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對中韓文化交流的一項重要貢獻。

在中國學術史上，對古代巫術的專門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的 30 年代前後。當時有一些學者就傳世載籍中有關巫術的記述作了開拓性的輯集和研究。他們大都受到當時流行的西方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如英國弗雷澤的《金枝》，由之產生了一系列膾炙人口的作品，如江紹原的《鬚髮爪》、鄭振鐸的《湯禱篇》。後者還特別提到要翻譯《金枝》這部巨著，但久久未能實現，直至 1987 年纔有徐育新等譯的縮寫本（列入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的“外國民間文學理論著作翻譯叢書”）。

記得我小時看周作人的書，其中介紹了英國哈利孫女士的《巫術史》，覺得很有意思，苦於不易得見。50 年代，竟在北京圖書館借到該書，從上面藏書章知道就是周作人原藏的那部。這部重要的書，也沒有人翻譯過來。

《金枝》的副標題是“巫術與宗教之研究”，全書貫穿著比較研究的方法，徵引極為廣博，然而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自然缺乏中國古代的材料。1936年，陳夢家先生在《燕京學報》發表《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與《商代的神話與巫術》兩篇論文，至今為國內外學術界所紀念。

重新強調中國古代巫術研究，並以之貫徹於商代歷史文化的，是長期在美國哈佛大學執教的張光直先生。凡讀過他的《商代文明》、《中國青銅時代》等書的，於此均有深刻印象。其中若干觀點，如對“絕地天通”的解釋等，竟已成為研究古史和考古的人們的常識了。

最近這些年，甲骨學和殷商歷史文化的研究又有了長足的進展，在前人已有的基礎之上，系統深入地考察商代的巫術與宗教，已經有了新的條件和可能。趙容俊博士的這部書，以及他正在進行的新的工作，將為此提出新的啟示，投射新的光明。

李學勤

2010年8月9日

目 錄

序	李學勤(1)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巫術的概述	(1)
一、巫術的概述	(1)
二、前賢研究成果的回顧	(3)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方法	(10)
一、研究目的與方法	(10)
二、材料的運用	(11)
第二章 巫義研究	(23)
第一節 巫術的定義	(23)
一、何謂巫術	(23)
二、巫術儀式	(36)
三、巫職傳承	(45)
第二節 巫術與宗教	(49)
一、巫術與宗教	(49)
二、巫教與薩滿教	(54)
第三章 巫術概況	(59)
第一節 古籍文獻上的巫術記載	(59)
一、“巫”字的創意討論	(60)

	二、先秦典籍中的巫者	(66)
	三、漢代典籍中的巫者	(74)
第二節	巫者的巫術活動	(77)
	一、交通鬼神方面	(78)
	二、醫療方面	(90)
	三、救災方面	(94)
	四、生產活動方面	(95)
	五、求子生育方面	(97)
	六、建築巫術方面	(99)
	七、喪葬巫術方面	(100)
	八、祝詛放蠱方面	(101)
	九、神明裁判方面	(104)
第四章	殷商甲骨卜辭所見之巫術	(109)
第一節	交通鬼神方面	(109)
	一、巫者的交通鬼神	(109)
	二、祭祀活動	(112)
	三、鳥圖騰崇拜	(120)
	四、占卜活動	(131)
	五、驅使鬼神	(145)
第二節	醫療方面	(151)
	一、巫醫合一	(151)
	二、占卜問病	(152)
	三、醫療巫術	(157)
	四、防疫除凶	(163)
	五、中國醫學的萌芽	(168)
第三節	救災方面	(171)
	一、祈雨活動	(172)
	二、止風雨的活動	(185)

三、戰時的活動	(192)
四、蝗災時的活動	(199)
第四節 生產活動方面	(201)
一、先秦文獻所見之生產活動	(201)
二、考古發掘的生產活動	(206)
三、甲骨卜辭所見之生產活動	(209)
第五節 求子生育方面	(216)
一、先秦文獻所見之求子生育	(216)
二、考古發掘的求子生育	(220)
三、甲骨卜辭所見之求子生育	(223)
第六節 建築巫術方面	(230)
一、先秦文獻所見之建築巫術	(230)
二、考古發掘的先秦建築	(232)
三、甲骨卜辭所見之建築巫術	(235)
第七節 喪葬巫術方面	(239)
一、先秦文獻所見之喪葬巫術	(239)
二、考古發掘的先秦墓葬	(244)
三、甲骨卜辭所見之喪葬巫術	(247)
第八節 祝詛放蠱方面	(251)
一、先秦文獻所見之祝詛放蠱	(251)
二、甲骨卜辭所見之祝詛放蠱	(258)
第九節 神明裁判方面	(260)
一、古籍文獻所見之神明裁判	(260)
二、法律的起源與形成	(263)
 第五章 先秦巫術的傳統及對後世的影響	 (271)
第一節 先秦巫術的傳統	(271)
一、上古時期	(273)
二、殷商時期	(279)

三、兩周時期	(284)
第二節 對後世的影響	(293)
一、文學方面	(293)
二、思想方面	(305)
三、藝術方面	(315)
四、科學方面	(321)

附 錄

一、殷商甲骨刻辭所見之“巫”字用例	(333)
二、殷商甲骨刻辭所見之“祝”字用例	(337)
三、殷商甲骨刻辭所見之“奏”字用例	(349)
四、殷商甲骨刻辭所見之“舞”字用例	(357)
五、殷商甲骨刻辭所見之“炆”字用例	(364)

參考暨引用書目

專 書	(366)
論 文	(393)
其 他	(405)

後 記	(406)
-----------	-------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巫術的概述

一、巫術的概述

崇信鬼神為古代宗教儀式即巫教儀式的最主要內涵之一^①，亦為許多人類社群共有的或普遍存在的巫術活動現象，中國古代社會即為其中之一。儘管已從考古學知識得知其約略，然其起源仍不易考察。既然如此，就夏商周三代而言，依古人傳述得知，其對鬼神之態度雖不盡相同，但其相信鬼神之存在且崇敬其權威，則並無二致^②。

至於古人所崇信的鬼神，於浩如煙海的古籍文獻中，有關祭祀對象的記錄甚多，如《周禮·大宗伯》載^③：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燎祀司中、司命、飆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據此不難得知，古代所崇信的鬼神，依《周禮》所記，可大別為三類。一、天神：昊

① 本書在定義上不將巫教信仰與佛、道、基督教等的教團宗教作區別，稱之為“巫教”。詳見本書第二章第二節。

② 《禮記·表記》中，借孔子之語記載三代對鬼神之態度：“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見《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禮記》卷第五十四《表記》頁1641～1642。

③ 《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上冊）《周禮·春官宗伯》卷第十八《大宗伯》頁757～759。

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雨；二、地祇：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三、人鬼：先王、先祖。

由此觀之，中國古代祭祀的對象，除至上神（帝、天）外，舉凡日月星辰、風雨雷雲、山川河海、草木鳥獸……乃至各種事物及死人之亡魂，均為神靈之一^①。如此大大小小的鬼神，於古人的觀念中，遂形成一種有別於人世間的“鬼神世界”。

巫術信仰（即巫教）為人類史上最早出現的文化形態之一，張光直曾言^②：

“巫”的宇宙觀在人類文化史上是相當常見的，但過去巫術與巫師在文明發展史上所起的重大作用，頗被忽視，這是因為研究文明史者多集中注意力於西方文明，而西方文明的發展經過和動力有它獨特的特點，在它那裏巫是不重要的。巫師和巫術起大作用的文明，如中國和馬雅，過去在文明起源一般問題的研究上並不受學者的注意。自 90 年代初開始，中國文明和馬雅文明在世界舞臺上逐漸受到重視，巫師與巫術在文明演進史上的重要性，也逐漸受到研究文明演進一般問題的學者的嚴肅考慮。因為中國的材料在這個題目上的啟示作用，在這裏我們應當將中國古代文明史上巫與巫術所扮演的角色，詳細地說明一下。

張紫晨在《中國巫術》一書中亦云^③：

它是人們在蒙昧階段對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種認識形式和實用的手段，並直接影響到人們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經過原始時期和蒙昧階段，因而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過巫術心理和巫術活動。

由上文可知，巫教的起源已有悠久的歷史，並在古時起過重要的作用。

不寧唯是，許多學者指出，巫者曾在古代中國執掌政教大權，以及祭祀、占

① 另見於《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下冊）《禮記》卷第四十六《祭法》頁 1587～1592，其所載之祭祀對象，亦大致與此相同。甲骨卜辭中所見的鬼神，亦可以《周禮》所別之三大類統括之。天神：上帝、日、東母、西母、雲、風、雨、雪；地祇：社、四方、四戈、四巫、山、川；人鬼：先王、先公、先妣、諸子、諸母、舊臣。詳見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頁 561～603。亦可參見本書第四章第一節。

② 張光直《中國古代史的興起與城邦的形成》頁 5～6。

③ 張紫晨《中國巫術》頁 1。

卜、醫藥、詩歌文藝等技藝知識^①。因巫者在上古社會，特別在有文獻遺存最早時代的殷商時期，具有極高的地位與影響力，故巫者活動乃成為古代人類文化的創造活動。

相對而言，周、秦以後巫者的政治地位迅速降低^②，但巫者政治地位的降低並不表示巫者社會活動的止息。尤其，擔任巫術性的活動，除巫者之外，亦有祝、史、卜、宗、樂工等^③。

由是觀之，精心考察其演變的過程，尤其先秦巫術的傳統方面仍有其重要性^④。

二、前賢研究成果的回顧

19 世紀後半以來，由於全球學術界皆已正視巫術或巫文化在人類史上的意義，故研究成果頗為可觀。受其影響，在考古學與上古史研究的帶動之下，中國古代巫文化研究方面亦取得若干成果。近一二十年間，巫文化的研究更有日益蓬勃的趨勢，成果亦愈加可觀。

（一）外國學者的中國巫術研究

詹姆斯·弗雷澤(James Frazer)的《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與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巫術、科學、宗教與神話》，於世界巫術研究的領域中，迄今仍有無法磨滅的貢獻與影響。然而，西方學者論著甚少涉及中國

① 主張巫者在古代中國執掌政教大權者，如陳夢家《商代的神話與巫術》頁 535 云：“由巫而史，而為王者的行政官吏；王者自己雖為政治領袖，同時仍為群巫之長。”李宗侗《中國史學史·史的起源》頁 3 亦云：“史與巫祝同是掌理天人之間各種事務。”白川靜《中國古代文化》頁 116～126 稱古代的帝王為“巫祝王”。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商代的巫與巫術》(第二集)頁 42～48 則指出：“既然巫是智者聖者，巫便應當是有通天地本事的統治者的通稱。巫咸、巫賢、巫彭固然是巫，殷商王室的人可能都是巫，或至少都有巫的本事。”此外，認為巫者為知識技藝的創造者與傳承者，如陳夢家前引文，頁 533～539；白川靜前引書，頁 128～137、148～182；周策縱《古巫醫與“六詩”考》頁 69～165、181～184、197～274；宋兆麟《巫與巫術》頁 7、293 等。

② 如梁釗韜《中國古代巫術》頁 196～208 即指出巫者地位的衰替關鍵在周代，由於職能分化的結果，使巫者喪失政治地位。許地山《道教史》頁 132～149 亦有類似的見解。另見於高國藩《中國巫術史》頁 111～204。亦可參閱本書第五章第一節。

③ 陳鐵彬《左傳中巫術之研究》頁 94～133。

④ 宋兆麟《巫與巫術·前言》頁 2 指出：“由於巫教是古老而跨時代的宗教，其社會性質則要具體分析。如同其他事物一樣，巫教也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其中可分為若干歷史階段：原生巫教、次生巫教和再生巫教，它們分別流行於史前時期、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並殘存到近代，以至現代。這三種巫教，不僅反映了巫教的發展過程，也說明它們有不同的社會性質。”

巫術的研究，或範疇、角度頗有可議之處^①。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儒教與道教》，時而將佛、道二教與巫信仰混為一談，凡此皆不足以提供我們瞭解中國巫信仰的實貌^②。

埃里亞德(Mircea Eliade)的《薩滿教》基於作者所收集的民族學、社會學、心理學等龐大的巫術資料，並且從比較宗教學的觀點從事總體性的整理。艾蘭(Sarah Allan)在《龜之謎——商代神話、祭祀、藝術和宇宙觀研究》一書中，討論有關龜的神話內容。此外，吉德煒(David N. Keightley)在《劍橋中國上古史》一書的第四章中有商王與大巫的討論。

白川靜的《中國古代文化》，其《巫祝的傳統》與《歌舞與藝能》兩章，主要討論上古時期政教合一的情形及文學藝術與巫祝文化的淵源。

大間知篤三等的《北方民族與薩滿文化——中國東北民族的人類學調查》，則為日本學者在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東北地區所進行的人類學調查報告。此外，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學論》、林巳奈夫的《中國古代的神巫》與加藤常賢的《巫祝考》等文章，亦可稱為頗有貢獻的中國巫術研究著作。又有池田知久的《池田知久簡帛研究論集》中的文章，以及近藤浩之的《包山楚簡卜筮祭禱記錄與郭店楚簡中的〈易〉》等，於先秦巫術問題的研究上，多參考近年出土文獻資料。

(二)中國學者的巫術研究

瞿兌之的《釋巫》與陳夢家的《商代的神話與巫術》二文最重要。前者廣泛引用史料，主要敘述先秦、漢代之巫術活動；後者廣泛運用卜辭與各種文獻資料，探討商代的巫文化，並析論古代巫大致有五種職司，包括祝史、預卜、醫、占

^① 見詹姆斯·弗雷澤著，徐育新等譯《金枝》一章頁 795～814，曾提及中國驅魔、埋祟等幾種巫術性的風俗。即使如此，弗雷澤引用此種事實的目的，僅作為若干例證而已，並未藉此對中國巫術或巫文化作較廣泛的分析。

^② 馬克斯·韋伯《儒教與道教》第三篇《道教·正統與異端(道教)》頁 231：“道教不過是個巫師的組織。佛教，就其傳入中國的形態而言，也不再是早期印度佛教那樣的救贖宗教，而變成實施巫術與秘法的僧侶組織。因此，道教與佛教，至少對俗人而言，沒有成為在社會學上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宗教團體。”由此觀之，馬克斯·韋伯基於宗教社會學的理論，多注重於其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與效果。除巫教之外，中國的儒家思想，佛、道二教，乃至於許多的民間信仰，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與效果頗為相近。然藉此不足以進一步瞭解中國古代巫術的實貌。此外，有關巫教信仰與佛、道、基督教等的教團宗教的區別，筆者將在本書第二章第二節中詳細討論。

夢、舞雩等，在當時巫研究領域中成為極具影響力的文章。王恒餘的《說祝》，討論各家之見解及祝字的演化，此文在與巫互相比較研究上頗為重要。

朱天順的《中國古代宗教初探》，論及秦漢以前的徵兆與占卜信仰，其中特別強調職兼觀察天象的巫者創造星占之法（頁119～180），惜未對巫者占卜之職作較多的分析。林惠祥的《文化人類學》、《民俗學》二書，運用當時國內新興的文化人類學及民俗學，以巫術（或稱為魔術）作為研究對象。

近年尤其自1989年以後，成績極其豐碩，如李安宅所編譯的《巫術的分析》，編輯有關巫術理論的內容，並聯繫中國習俗實況所寫成^①。梁劍韜的《中國古代巫術——宗教的起源和發展》及臧振的《蒙昧中的智慧——中國巫術》二書，皆以上古時期的巫術發展為主題，除理論層次外，並討論中國巫術內容^②。潛明茲的《中國神源》一書，則考察古人崇拜的諸神的起源。

就通論古今巫術的著作而言，如宋兆麟的《巫與巫術》，主旨包括人與巫術，故探討的對象包括巫者及各項巫術。張紫晨的《中國巫術》，除介紹各類巫術之外，並論及其對各文化層面的影響。胡新生的《中國古代巫術》，特點在於對中國古代曾經盛行的典型的巫術（即常用於直接控制自然、社會及個人生活的發展進程等的巫術），試圖作一次全面的清理。高國藩《敦煌巫術與巫術流變——中國民俗探微》，其最大特色在於取材極為廣泛豐富，包括各種經史筆記、敦煌佛道文獻、吐魯番文書及少數民族的民俗資料等，藉以探討中國歷史上曾出現的各種巫術形態。又在《中國巫術史》一書中，著重於微觀的剖析而達於中國巫術史的宏觀概念，以之考察與探索中國從古至今的各類巫術流變史。

若就出土文獻與巫術相關之著作而言，李零的《中國方術正考》、《中國方術續考》二書，結合考古材料，系統總結戰國秦漢時期的方術知識。詹鄞鑫的《心智的誤區——巫術與中國巫術文化》一書，則運用考古、古文字、古文獻材料，以及民族調查的各種資料，以文化人類學的方法，探討中國巫術文化。

① 此書總為三部，其中第二與第三部，分別選譯自弗雷澤與馬凌諾斯基的作品；第一部《巫術的分析》，李安宅據二人的巫術理論，探討中國巫術的情形。全書雖新意無多，但由於李安宅對巫術問題關懷甚早，頗有引領後進之功。參張紫晨《中國巫術》頁17～18，對李安宅的此著略有介紹，但文中誤植為李安寶。

② 《中國古代巫術》運用人類學的理論依據與分析古書材料的方法，探討巫術與宗教的起源等問題。《蒙昧中的智慧》則兼論往後巫術對儒、道、佛、醫各領域的滲透。

如今，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豐碩，故出土文獻與巫術方面的成果及著作，亦愈加可觀。李學勤的《周易溯源》一書，搜集考古學、文獻學以及古文字學方面的大量資料，且辨析毫芒，於《周易》研究上已獲得豐碩成果。此外，又有李家浩的《包山祭禱簡研究》等文章。

就整理出土文獻的專著而言，李均明的《古代簡牘》一書，全面綜述 20 世紀出土簡牘的概況，對其內容及分類進行較為深入的研究。劉國忠的《古代帛書》，則集中討論長沙楚帛書及馬王堆帛書的發現、整理與研究情況，又對以往的學術研究略作學術史方面的總結。此外，王宇信、徐義華的《商周甲骨文》一書，則介紹目前為止商周甲骨文的發現、整理與研究情況，又闡述了對甲骨學研究的展望。

綜合性的戰國楚簡釋文著作，如陳偉等著的《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十四種）》。此書收錄包括包山、郭店、望山（二批）、九店（二批）、曹家崗、曾侯乙、長臺關、葛陵、五里牌、仰天湖、楊家灣、夕陽坡等十四種簡冊資料，共計整簡、殘簡三千五百多枚，並有釋文及注釋，則可謂楚地出土簡冊文獻的集大成書。此外，晏昌貴的《巫鬼與淫祀——楚簡所見方術宗教考》一書，則討論楚卜筮簡、《日書》簡所反映的宗教的性質及其特徵。

就其他研究巫術的專著而言，如王振復的《巫術——〈周易〉的文化智慧》，探討古代中國巫術與《周易》有關的文化智慧問題。宋兆麟的《生育神與性巫術研究》，則搜集生育信仰與性巫術的資料，較為具體探討中國古代生育信仰與性巫術中的若干問題。

各書在分析巫術時，亦皆突顯巫術在醫療上的功能。漆浩的《醫、巫與氣功——神秘的中國養生治病術》以及何裕民、張曄的《走出巫術叢林的中醫》二書，皆牽涉中醫的起源問題^①。廖育群的《中國古代咒禁療法研究》一文，探討中國古代巫醫的施術實例。此外，就最近中醫學方面的著作而言，如周慎主編的《中華醫書集成》，共三十三冊，按科別及文獻分類，全盤整理醫學古籍文獻。又

① 《醫、巫與氣功》以巫術與醫學（而非作為人的巫者與醫者）為核心，討論其內容、形式上的關聯及其與氣功的關係。《走出巫術叢林的中醫》，則以中醫的發展為主軸，探討在中醫起源與發展的過程中，巫術的影響與排斥或殘留的情形。二書的共同特色是運用民族學資料，這是由於古代有關巫或巫術活動的直接記載有限，故適當運用民族學資料，的確有助於解讀相關史料。

有堪稱中國第一部醫學通史的陳邦賢的《中國醫學史》以及齊濤主編的《中國民俗通志》(醫藥志)、馬伯英的《中國醫學文化史》等。

除醫療功能之外,涉及占卜術的研究專著,如衛紹生的《中國古代占卜術》,以唯物主義的觀點,由歷史的角度對占卜術加以剖析、闡述。劉玉建《傳統文化溯源——中國古代龜卜文化》一書,將中國古代文獻典籍中有關龜卜的記載,全部收錄與整理,並作出分析。

就文學方面的著作而言,文學作品所反映的有關巫術的研究,則有過常實的《楚辭與原始宗教》。此書由原始宗教(巫教)的特定角度,系統且全面地對《楚辭》的生成、文本形態及文化功能,作了積極的探索^①。神話學對巫術方面的研究作品如鄧啟耀的《中國神話的思維結構》,由人類思維的發生、發展的歷史軌跡,總覽思維分化演變的綜合圖景^②。潛明茲的《中國神話學》序云:“最早的知識分子來自巫師,當他們從非專業脫變為專業宗教者以後,由他們口傳或筆傳的經書中,不但保留了大量神話,也反映了明顯的宗教意識。”故不難得知神話與巫術的聯繫。

研究有關藝術及其他方面的專著,如劉錫誠的《中國原始藝術》,搜集了極其豐富的原始宗教(即巫教)、口頭文學、造型藝術等方面的資料,拓展了原始藝術研究的領域。

研究有關對後世影響的專著,如任繼愈主編的《中國道教史》^③,探討了巫道的淵源問題。武乾的《中國古代對巫術邪教的法律懲禁》,對於中國歷代政府懲禁巫術、邪教的法律措施及其特點,略予評述。

中國少數民族的巫術研究以探討少數民族巫術為主題,如宋兆麟的《巫與民間信仰》,重點在於探究少數民族的神話傳說與民間信仰的巫術意義。呂大吉、何耀華主編的《中國原始宗教資料叢編》,則運用田野調查,以及搜集原始宗教的第一手資料,研究與整理納西族、羌族、獨龍族、傈僳族、怒族的原始宗教形態,具有

① 《楚辭與原始宗教》頁19~40、91~149。此書由文化史的觀點,結合《天問》的內容、形式,論其為一部巫史文獻,亦指出《離騷》的誕生及其獨特的結構方式,皆與某種巫祭儀式有關。

② 《中國神話的思維結構》頁57云:“神話的非認識功能,主要體現為特定文化的價值功能。反映在思維結構上,神話的思維結構中思維主體與思維對象的‘混沌’狀態,促成了所謂‘萬物有靈’的信仰,強化了類似巫術和宗教的價值功能。”

③ 《中國道教史·道教的孕育與誕生》頁9~11指出,早期道教的主要來源為民間的巫術。

極為重要的意義。

劉小萌、定宜莊的《薩滿教與東北民族》，則運用歷史學、文化學、宗教學的理論與方法，考察東北民族原始信仰的內容及特點。宋和平的《〈尼山薩滿〉研究》，深入中國東北通古斯民族地區，進行薩滿文化調查，研究分析滿族群衆的文學作品《尼山薩滿》中之薩滿文化特色。

戈阿干的《東巴骨卜文化》，運用收集的田野調查的記錄，以及古代漢文經典，提出在東巴骨卜文化中原生文化形態的價值。周錫銀、望潮的《藏族原始宗教》一書，較為客觀地評價藏族原始崇拜與信仰、巫者與巫術、原始信仰活動方式與禮儀、神話與傳說、原始宗教的演變等，為系統論述藏族原始宗教的學術專著。楊鵬國《苗族舞蹈與巫文化——苗族舞蹈的文化社會學考察》以苗族舞蹈為中心，論及與其相涉的巫文化層面。

就研究巫術的學術論文與專著而言，如張光直的《商代的巫與巫術》、《從商周青銅器談文明與國家的起源》二文與《美術、神話與祭祀》一書，延續了過去考古學與上古史的研究成果，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巫術的專著^①。《人類歷史上的巫教的一個初步定義》共舉十三項個例，闡明巫術為何被稱為巫教，且如何在宗教系統上理解巫教等問題。

此外，較為重要的論文有周鳳五《說巫》（頁269～291），此篇運用甲骨文、金文與其他相關出土文物，探討巫在上古社會中的角色身分，以及“巫”字造字之初誼。饒宗頤的《巫的新認識》根據卜辭及兩項周原新出土之涉及巫的材料，作了若干整理與詮釋。

戰國竹簡資料相關之文章，有李宗焜的《數字卦與陰陽爻》一文，以及黃人二《戰國包山卜筮祝禱簡研究》與邴尚白的《楚國卜筮祭禱簡研究》等。

就探討有關巫術對後世影響方面的專著而言，如許地山的《道教史》，討論

^① 通貫三篇，張光直的主要論點為：中國文明的起源，其關鍵為政治權威的興起與發展。獨占天地人神溝通的手段，則為取得政治權力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並且中國古代政教不分，巫史進為官吏，王者更為群巫之長。巫者如何通貫天地人神？對此，張光直指出，巫者運用若干媒介，例如山、樹、鳥、動物、儀式與法器、酒與藥物、飲食與樂舞等，方能完成其事。